

观众于国博观摩《大唐中兴颂》石刻拓片

石可载道拓片有情

——摩崖上的中兴颂——
□本报记者 许莹

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古人题名,就其山而凿之,用以“化育群论”“记功立言”,是谓摩崖。

永州作为荆楚至岭南的水运要冲和湘桂文化走廊的重要节点,自古文风鼎盛,迁客骚人,往来者众,元结、怀素、柳宗元、周敦颐、何绍基等文学艺术家都曾生活于兹。先贤们以摩崖石刻的形式唱和诗文,交流心灵,并为后人所追慕和效仿。经过唐代始创、宋代流行、明代追摹和清代考据的千年积累,形成了历代诗文同处一崖的独特文化现象,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动人心弦,蔚为壮观。永州地处潇湘二水交汇处,雅称“潇湘”,境内摩崖石刻更是多沿水分布,现存古摩崖石刻2000余方,其中以唐宋摩崖石刻最具代表性。境内浯溪、阳华岩、朝阳岩、玉琯岩、月岩、淡岩、月陂亭等7处摩崖石刻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浯溪摩林为中国南方最大露天碑林。

9月18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的“摩崖上的中兴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精心遴选自唐至近代永州摩崖石刻拓片近60件(套),通过摩崖石刻这一见证中华文明流变的代表性物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此次展览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民安国定,摩崖颂中兴”以历史为主线,重点展陈《大唐中兴颂》《大宋中兴颂》《大明中兴颂》等石刻拓片。其中,以元结撰文、颜真卿书写的《大唐中兴颂》最负盛名,是颜真卿一生中唯一的摩崖石刻书法作品。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唐军收复长安和洛阳。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有整兵拒贼之功的元结,撰写了《大唐中兴颂》一文,盛赞玄宗、肃宗“复两京,还京师”“宗庙再安,二次重欢”,谓此事件为堪比前代帝王之盛德大业的“中兴”。一篇《大唐中兴颂》,反映了百姓对于国家复兴、社会安定的美好愿望。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元结请颜真卿书写此颂,镌刻于永州的浯溪崖壁,因“文”“字”“石”奇绝,被后世称为“摩崖三绝”,引后世无数文士登临凭吊,追慕仿效。

第二部分“地缘人彰,山水绿潇湘”以人文为主题,重点展陈历代名家大师在永州留下的珍贵墨宝。其中,怀素小草《千字文碑》与大草《千字文》石刻,在书法史上被世人合称为“双壁”;苏轼《荔子碑》乃韩愈撰文记载柳宗元事迹的书法石刻,文化价值极高;《浯溪诗刻》作为米芾的早年代表作,有效弥补其早期纸绢墨迹稀少的遗憾。书法为“六艺”之一,前代学人大多重视书法艺术,为提高书艺孜孜追求。摩崖临习石刻拓片常常是古代学习书法的主要途径。名家一方面受惠于前代佳构,一方面又将得意制作镌刻于石上,垂范后世。石可载道,石以字灵,后来者既可从中体会前贤者为人处世之高洁,又能习得名家们行文作句之功力。

展出同期,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了“摩崖石刻中的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书法家协会、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学史、书法艺术、历史学、古文献研究、数字网络传播以及摩崖石刻、潇湘文化与文旅发展研究等议题进行交流发言,深入探讨永州摩崖石刻中的历史、文化、艺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指出,石刻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要深入挖掘和阐发永州摩崖石刻中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深刻揭示并探讨永州摩崖石刻的历史背景与传播规律,让这一瑰宝更好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蒋祖炬表示,“摩崖上的中兴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反响强烈,是永州千年摩崖石刻第一次晋京大展,是永州千年摩崖石刻第一次全国性重要学术交流,是永州千年摩崖石刻最大力度、最广范围的一次传播,有效提升了永州摩崖石刻的热度,相信这次展览和研讨必将激活传统经典文化遗存,必将有力助推摩崖石刻等潇湘文化广为传播。永州市委书记朱洪武谈到,永州摩崖石刻,正是永州“人文之书”的精彩华章和精美插图。将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更加充分地发挥永州丰厚的历史文化优势,聚焦“新永州、好永州、美永州、福永州”,擦亮“千年打卡地·此处是潇湘”文旅新名片,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让永州成为人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今年“十一”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的群众选择走近摩崖石刻,走近永州,据不完全统计,国庆假期永州市接待游客230万人次,同比增长7.39%。原计划在国博展出一个月的“摩崖上的中兴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近日也宣布延期。观众作为“来者”,以同理心为钥匙,地理环境为车马,将从永州摩崖石刻中切身感受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和感人魅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大唐中兴颂碑

鲁迅的新文化与中国古代金石传统

□杨爱国

鲁迅(1881—1936)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批判国民劣根性、推动白话文、新兴木刻运动等方面做出了永垂青史的贡献。以前,鲁迅更多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被纪念的,近年来,鲁迅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继承受到学界的关注。鲁迅在《中国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无疑是中国的脊梁,也是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今年适逢鲁迅诞辰140周年,通过对鲁迅的新文化与中国古代金石传统关系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他的革命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革命,这对今天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金石传统

本文所谓的中国古代金石传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金石本身的传统,即青铜器及其铭文,石刻文字与画像,其他文物如砖文、瓦当等;二是对金石文物及其文字图像著录的传统,即所谓的金石学。从现有资料看,鲁迅先生更重视金石本身的传统,对金石学有关注,但相对较少。

中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于3800年前的二里头时代,在青铜器上铸铭文则要晚到殷代,也就是传统所谓的商代晚期,开始只是族徽、人名等简单的图案、文字,从西周开始才有记事的长篇铭文,如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何尊上的铭文,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即俗称的“金文”。

如果把岩画算作石刻,那么石刻出现的时间比金文要早得多,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如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据考证有7000年的历史。而在石头上刻字则要比金文晚得多。现今人们认可的较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年代虽有争议,但多数人认为是东周时期的。石刻文字,尤其是碑刻、墓志繁荣起来是东汉以后的事。画像石并不是岩画的延续,它是汉代新兴的、主要为丧葬礼俗服务的艺术,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后代仍有延续。南北朝以后,不仅碑刻、墓志大兴,其他石刻文字,如造像记、经幢等也十分丰富。

从西汉开始,金石文字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历史学家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虽然文字中没有提到他考察石刻的事,从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刻石文字的记录看,司马迁在四处访古时考察当地的金石文字是完全有可能的。

郦道元《水经注》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也是现存最早的记录石刻的著作之一。它对当时各条水道附近的名胜古迹,尤其是所存石刻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收集了各种传说和史料,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史实考证。书中收录汉代石刻100多处,曹魏碑刻近20件,还有两晋、刘宋、北魏等朝代的石刻。

北宋时期金石学兴起,对前代金石文字开始了大规模的收集、著录与研究。最早在书名中用“金石”的是曾巩的《金石录》,惜书已不存。宋代金石学著作留存于世的有王黼《宣和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味堂集古录》、洪适《隶释》《隶续》等。宋代金石学著作既有著录金石目录和跋尾的,也有著录尺寸、形状的,还有摹录图像、铭文的,也有略加考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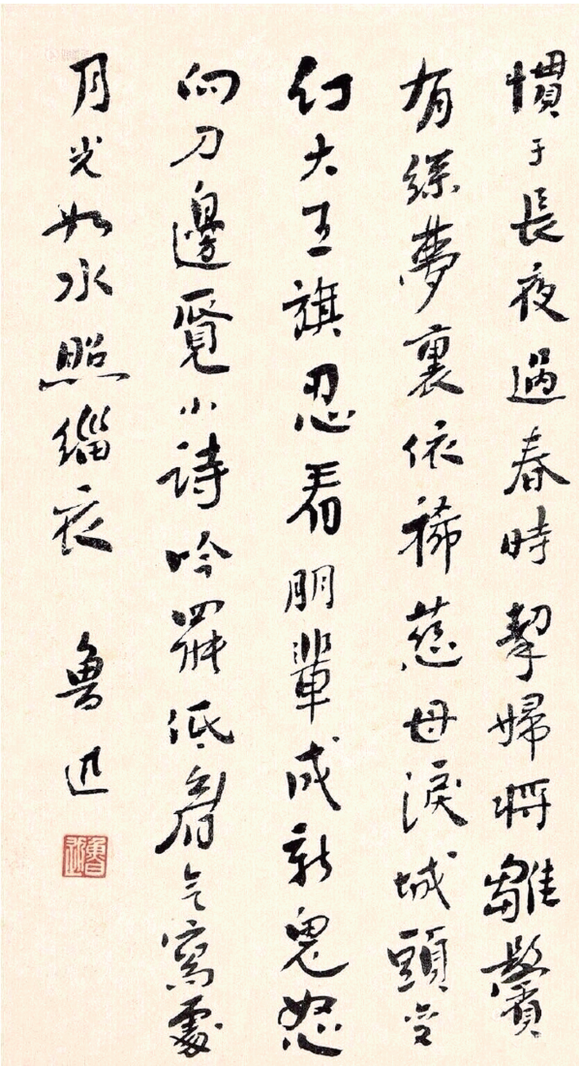
清代是金石学昌盛时期,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清初虽然只是初兴,但却有知名的代表作,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和《石经考》。乾隆年间金石学昌盛,有皇帝亲任主编的《西清古鉴》《宁寿古鉴》《西清古鉴续编甲编》和《乙编》四书,收录了清宫收藏的青铜器。据容媛《金石学书目》统计,乾隆以后约200年的时间里,金石学著作有906种之多,由此可见金石学昌盛之一斑。不过,这些著作多是继承宋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是著录的量大增,尤以王昶《金石萃编》为最。真正在学科层面上有创新的要数清末叶昌炽的《语石》。该书是中国第一部通论古代石刻文字的专著。作者积二十年之功,搜集各种石刻8000余种。根据这些材料,参考其他著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写成此书,宣统元年(1909)在苏州府城刊刻问世。

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加入了新发现的甲骨、简牍,甚至明器也纳其中,范围有了明显扩大。出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等金石学研究大家,还有马衡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随着近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传统的金石学走到了尽头,被新的考古学、文物学、古文字学、甲骨学、简牍学等所取代,但它著录的资料一直为今人所引用,一些学术观点为今人所肯定,学术贡献会长存于世。

鲁迅的抄碑与收藏

1912年秋,鲁迅任北京政府教育部金事,从此时至1917年,鲁迅在工作之余大量抄碑,辑录金石碑帖。

抄碑的同时,鲁迅开始收藏金石拓本,以石为主,还有砖文、瓦当等。自从32岁得到胡孟乐赠送的十枚山东嘉祥汉代画像石拓本后,鲁迅对汉代画像石拓本的兴趣与日俱增,并且主动购买拓本。鲁迅对每次购买的拓本都仔细记录。如1915年5月1日从琉璃厂购得武梁祠画像并题记拓本等五十一枚,这是他购买山东汉代画像石拓



鲁迅书法月光如水照缁衣

本最早的记录。就在这一个月,他后来又去了琉璃厂数次,其中四次购买了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

有些人知道鲁迅在购买汉代画像石拓本后,主动把拓本寄给或送给他,希望他能买。如1915年10月4日,富华阁送来嘉祥等汉画像拓本137枚,出土地点分散在嘉祥、汶上、金乡等地,鲁迅认为拓本质量不是很好,但还是买下了。鲁迅还请人代购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对此,他同样有仔细的记录。1916年1月12日,汪书堂为鲁迅代购山东金石保存所藏汉画像十枚,嘉祥画像十枚,汉画像残石二枚。

在收藏过程中,鲁迅对拓片的优劣也有要求。1934年6月9日,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五六年前,所收不可谓少,而颇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画像》《孝堂山画像》《朱鲋石室画像》等,虽具有,而不中用;后来出土之拓片,则皆无用,上海又是商场,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补收否?即一面收新拓,一面则觅旧拓(如上述之三种),虽重出不妨,可选其较精者付印也。”

对拓本的要求除了品质之外,更重要的是真伪的鉴定,鲁迅也是如此。传统的金石学家对石刻多重视有文字的碑刻和佛教造像题记,对汉代画像石并不是很重视,因此,拓本市场上没有假东西,但自晚清以后,随着嘉祥武氏石室拓本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假货也开始出现了。鲁迅虽然在1913年才开始拥有汉代画像石拓本,但很快就入了道,能够鉴定伪刻了。1916年11月10日,鲁迅从琉璃厂德古斋购得汉画像拓本二种,原为托洛洛氏旧藏,上有字,鲁迅鉴定为伪刻。1934年6月18日和1935年5月14日在致台静农的信中也都提到翻刻的事,后一封信这样写道:“至于拓片两包,是都收到的,‘君车’画像确系赝品,似用砖翻刻,连盖章印也是假的。原刻之拓片,还要有神彩,而且必连碑阴,乃为全份。又包中之《曹望情造象》,大约也是翻刻的,其与原刻不同之处,见《校碑随笔》。”

除了记录自己收藏的汉代画像石拓本,鲁迅还做了编书的准备,拟了《汉画像集》目录,编了汉画像目录、嘉祥杂画像目录、石刻目录、石刻杂件、金石杂件、古物调查表抄、各县金石录摘抄等,这些文献都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由这些文献可见先生当年在汉代画像石及古代碑刻上下的功夫是很大的。

鲁迅收藏的汉代画像石、瓦当、砖文拓本已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成《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I、II,《鲁迅藏拓本全集·瓦当卷》,《鲁迅藏拓本全集·砖文卷》I、II,由西泠印社出版社于2014、2015、2016年出版。

鲁迅倡导的新文化对中国古代金石传统的继承

鲁迅对汉画像艺术十分赞赏,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他的观点。鲁迅在1935年2月4日给李桦的信中写道:“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9月9日致李桦信中说:“我以为明木刻大有发扬,但大抵趋于超世间的,否则即有纤巧之感,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于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

许寿裳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曾记录鲁迅的话:“汉画像的图案,美妙绝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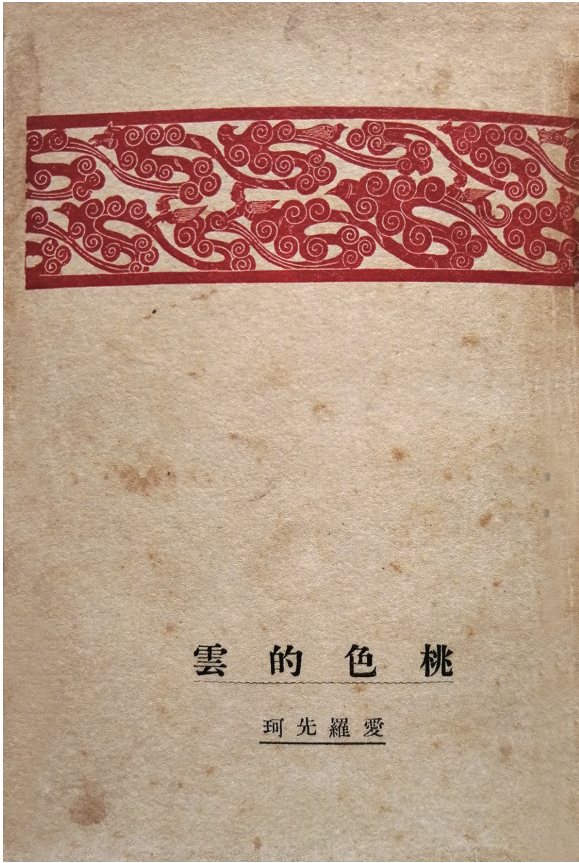
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许寿裳:《鲁迅回忆录·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鲁迅虽然没有收藏,甚至也没见过汉代画像石,但他的上述评价不是凭空泛论,而是建立在他对汉代画像石拓本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鲁迅在赞赏汉代画像艺术的同时,还在一些文章中引用画像资料作为证据。1914年,鲁迅先生在考证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胡须时,引用的是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画像。他在《坟·说胡须》中写道:“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男子胡须多翘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

写完《说胡须》不久,鲁迅从北京琉璃厂购得武梁祠画像并题记拓本等61枚,并在《朝花夕拾·后记》中写到:“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或雕刻古来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事。但现在手头上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这种作为资料使用的现象,还表现在他给友人的信中。1934年2月11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说:“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茫然无所知……生活状态,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此象《金石萃编》及《金石索》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



鲁迅为《桃色的云》设计的封面

鲁迅不仅收藏、研究汉代画像艺术,在推动新兴木刻运动时,鼓励年轻人参考借鉴汉代画像艺术,还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带头继承汉代画像艺术。他给爱罗先珂《桃色的云》一书设计封面,所绘之云即来自山东嘉祥武氏前石室前坡西段画像上的卷云。鲁迅的书法更是他多年抄碑的成果。

专家们对鲁迅收藏、研究汉代画像石、抄碑有专门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我们深入了解鲁迅的新文化与中国古代金石传统是大有启发的。杨义认为,鲁迅收藏、研究汉画像石是遥祭汉唐魄力,并从以下八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天地大美与精神驶轹中的本真;增加文化厚度和精神深度;直逼传统学术与艺术的精髓;重铸刚健清新的民魂与国魂;进入古代生活史、精神史;在学术预流中沟通历史与当代;形式性的继承与点化;谛视诡异的心灵现实与遥祭汉唐魄力(《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画像石》,《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王芳认为与鲁迅相关的金石传统有三条不同的文化脉络:一是辛亥革命前鲁迅追慕顾炎武——章太炎独特的民族主义思想、实践以及生命状态。二是辛亥革命之后复辟轮回,鲁迅转入以隐逸为姿态“鈔古碑”,接续并改造了金石传统中学隐的文化脉络。三是包括金石在内的古美术资源,从1918年前将其视为凝聚“国魂”的遗物,到二三十年代,明确了对“中华民国”意义上“民魂”的探索和发展(《金石传统与鲁迅“鈔古碑”的多维向度》,《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鲁迅先生收藏有5100余种历代碑刻、画像拓本,先生对这些拓本都做过一定程度的整理和研究,并且试图由此写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虽然最终都没有完成,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他对待传统文化研究之深。因此,鲁迅提倡的新文化,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要融汇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为一体,开辟一个新世界。

“青出西海——青海少数民族青年美术作品展”在京开幕

“横空出世莽昆仑,三江源流日日新”,传统文化源远流淌,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翻开青海这一篇章,无论是神秘的日月山,美丽迷人的仙女湾,还是雄伟壮观的昆仑山,历史悠久的七彩丹霞,都激发艺术家们强烈的创作热情。9月14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指导,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海美术家协会主办,北京吉祥大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青出西海——青海少数民族青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文联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开幕。

本次展览作品主要选自青海少数民族青年美术家创

作的多种艺术形式作品80件,其中唐卡作品38件,给予观展者一场艺术与美的视觉盛宴。展览中由青海少数民族青年美术家仁青才让创作的《吉祥五尊》《九大护法》《八马财神》等唐卡作品,极具民族特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用十分明亮而又丰富的色彩描绘出了一个属于唐卡的神圣世界。唐卡的颜料天然且珍贵,保证所绘制出来的唐卡色彩鲜艳明亮、璀璨夺目,也正因如此,唐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被誉为中华民族绘画艺术中弥足珍贵的财富,也是青海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此外,中国画作品《暮影》《红崖村的春天》,油画作品

《祁连秋韵》《洪荒之灵》,版画作品《筏涌大河下青海》《红墙之四》等描绘了青海独特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散发出古拙原生的淳朴气息,反映了青海少数民族群众建设家园、追求梦想的时代画卷,也体现了他们对于艺术的探索与追寻。

青海少数民族青年美术作品展不仅是对青海高原美景、风土人情、游牧农耕文明的一次重温,更是青海美术家们对青海文化的体悟与探索。他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艺术语言诠释了青海文化和中华传统文明,彰显着中国文化的魅力。(许莹)